

文明的起源

——宋代学者的历史哲学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 濂溪研究所/国学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199)

[摘要] 文章以邵雍《皇极经世》、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刘恕《通鉴外纪》与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为例,大略梳理了宋代史学中的四种倾向。宋代学者带有义理意味的历史著作,近似于现代学术的历史哲学,虽与实证方法不同,但其学术作用不失于积极主动,其学术传统仍来自于久远。尤为重要的是,宋人追溯远古洪荒时代,均以高雅的文明境界作为历史的开端,代表了古代史学传统中的一种重要趋向。

[关键词] 古史开端; 文明起源; 历史哲学; 宋代史学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1-0090-06

我国上古历史年代久远,文献缺失,难有确论,是肯定的。但是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以来,有极端学者以西洋科学观念为依托,主张用实证的方法重新整理国故,甚者提出“证全部皆真”的问题^[1]。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其实,对于任何古史文献,甚至差不多所有历史文献,要求证明其‘全部皆真’,都是不可能的。历史文献的记载,不会‘全部’符合历史事实,即使符合历史事实,也不会‘全部’能够由‘拿证据来’而得到满意的证明。就是近现代史文献,也每每如此”^[2]。

提出“证全部皆真”问题的人,实则对于上古史官传统与史学精神完全外行,故其思想仅停留在西洋19世纪的科学知识水准上。因为设想让上古的所有史实都随时可以拿出多重证据,像法官判案那样,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史学的目的也并非如此保全证据。但是这样一种观念,却长期影响着史学界。近百年来,认为我国上古史茫昧无稽的看法十分普遍,其结果恰恰造成了一种最不科学的态度,即尚未耐心理解先人古史实质,就率尔误读,按照合乎自己是欲的观念将现代意识强加给古人。学者急于做出结论,所谓结论一旦出来,群起相应,不假思索。其实关于古书古史的理解和体认尚且存在相当的空当和余地,甚至可以认为,在诸多进化论史观的误读之后,真实的上古史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重写。

宋代学者带有义理意味的历史著作,近似于现

代学术的历史哲学,虽与实证方法不同,但其学术作用不失于积极主动,其学术传统仍来自于久远。尤为重要的是,宋人追溯远古洪荒时代,均以高雅的文明境界作为历史的开端,代表了古代史学传统中的一种重要趋向。本文尝试举出邵雍《皇极经世》、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刘恕《通鉴外纪》与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为例,大略梳理了宋代史学中的四种倾向。

一 先秦时期的历史观念

我国古代先秦时期有几种历史观念,似有若干合理性,值得注意,但何以如此,其真义一时尚不易判断,要之亦未可一概否定。譬如:

(一)由春秋时期的风胡子提出来的“石一玉一铜一铁”的“物质”的历史观

《越绝书》:风胡子曰:“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乎,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

(二)由战国后期的韩非提出来的“上古—中古—近古—当今”的“进化”的历史观

《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

[收稿日期] 2014-09-05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经学之开山”资助(项目编号:14BZX055)

[作者简介] 张京华(1962-),男,北京市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濂溪研究所、国学研究所所长。

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以下论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当今之世从略)

(三)由老子提出来的“道—德—仁—义—礼”的“退化”的历史观

《老子·德经·三十八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老子的弟子文子对此作了补充，将“道—德—仁—义—礼”归纳为“仁义—礼乐—法度”：

《文子·下德》：“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

《文子·上义》：“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

(四)由孔子提出的“大同一小康”的“退化”的历史观

《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是谓小康。”

“小康”是夏商周三代，“大同”是指三代以前的唐尧虞舜时期。小康不及大同，三代不及唐虞。

(五)《吕氏春秋》对于上古礼俗的记载，近似现代史学“母系社会”之说

《吕氏春秋·恃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

晋唐学者对此也颇有认同：

《晋书》：“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

《梁书》：“禽兽知母而不知父。”

《魏书》：“知母忘父，盖亦禽兽。”

《北史》：“知母而不知父，识比野人，义近禽兽。”

《新唐书》：“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则父母等，都邑之士则知尊称，大夫则知尊祖，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

以上几种先秦时期的历史观念，如果出于权宜方便，可以用“进化”、“退化”两种趋向加以论定，但实际情形要更加复杂。由此即可见古人历史观自先秦时就已十分丰富和多元化。

到了宋代，学者宗法儒家理学，追溯上古文明，

提出若干历史观念，虽然看似一种“历史哲学”，其实仍有斟酌参考的价值。

二 宋代学者的历史哲学

(一)整齐与逐节退化——北宋邵雍的历史观

北宋邵雍提出的历史观，可以简化表示为“三皇—五帝—三王—五伯”。

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第四》说：

“修夫意者，三皇之谓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谓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谓也。修夫数者，五伯之谓也。……皇帝王伯者，《易》之体也。……意言象数者，《易》之用也……”

又说：

“三皇同意而异化，五帝同言而异教，三王同象而异劝，王伯同数而异率……”

“三皇同仁而异化，五帝同礼而异教，三王同义而异劝，王伯同智而异率……”

“三皇同性而异化，五帝同情而异教，三王同形而异劝，王伯同体而异率……”

“三皇同圣而异化，五帝同贤而异教，三王同才而异劝，王伯同术而异率……”

又说：

“夫意也者，尽物之性也。言也者，尽物之情也。象也者，尽物之形也。数也者，尽物之体也。仁也者，尽人之圣也。礼也者，尽人之贤也。义也者，尽人之才也。智也者，尽人之术也。尽物之性者谓之道，尽物之情者谓之德，尽物之形者谓之功，尽物之体者谓之力。尽人之圣者谓之化，尽人之贤者谓之教，尽人之才者谓之劝，尽人之术者谓之率。道德功力存乎体者也，化教劝率存乎用者也。”

邵雍以皇、帝、王、伯比附《周易》的意、言、象、数，这种对应关系可以简化表示为“皇—帝—王—伯”，或“意—言—象—数”，或“化—教—劝—率”，或“仁—礼—义—智”，或“性—情—形—体”，或“圣—贤—才—术”。

对于这种推演整齐的历史观，南宋朱熹曾经做过说明，《朱子语类》载：

“问读史之法。曰：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温公初作《编年》，起于威烈王，后又添至共和后，又作《稽古录》，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独邵康节却推至尧元年，《皇极经世》书中可见。”(卷十一)

“问：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曰：此是《皇极经世》中说，今不可知。他只以数推得是如

此。他说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会、三十运、十二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岁月日时,元会运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卷四十五)

“至之问:康节说‘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是否?曰:模样也是如此。《经世书》以元统会,十二会为一元,一万八百年为一会,初间一万八百年而天始开,又一万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万八百年而人始生。初间未有物,只是气塞。及天开些子后,便有一块渣滓在其中,初则溶软,后渐坚实。今山形自高而下,便似倾泻出来模样。”(卷四十五)

“淳曰:每常见山形如水漾沙之势,想初间地未成质之时,只是水。后来渐渐凝结,势自如此。凡物皆然。如鸡子壳之类,自气而水,水而质,尤分晓。曰:是。”(卷四十五)

“论《皇极经世》:乃一元统十二会,十二会统三十运,三十运统十二世,一世统三十年,一年统十二月,一月统三十日,一日统十二辰;是十二与三十迭为用也。”(卷一百)

“《易》是卜筮之书,《皇极经世》是推步之书。”(卷一百)

“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卷一百)

“康节天资极高,其学只是术数学。后人聪明能算,亦可以推。”(卷一百)

朱熹对邵雍的评价,比较谨慎,言语不多,但对其学问总体上加以肯定是明了的。由朱熹的解读,可知邵雍的历史观有三个特殊见解:(1)整齐与逐节退化的特征,“皇、帝、王、伯”、“意、言、象、数”整齐排序,由高级向低级逐节退化。(2)其历史年表可以上推至帝尧元年。(3)其历史周期跨度极大,以“元、会、运、世”相乘积,三元共计 38 万余年。

邵雍为理学家,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并称“宋五子”,而北宋去古甚远,故而在以实证为基础的现代历史学科研究中,鲜有学者引用他的历史观。邵雍的历史观可以说纯然是一种思想观念,或者说是一种历史哲学。但问题是,实证史学亦无法回避古史与文明起源问题,而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确有不为语言文字、物质工具所限定之一面,故理学家历史哲学的研究视角亦不可忽略。

(二)文明的皇王史——胡宏的历史观

胡宏著《皇王大纪》八十卷,内《皇王大纪论》一卷。开篇云:“鸿荒之世,结绳而治。”又云:“鸿荒文明,天行也。”可知胡宏虽然了解“结绳”的原始鸿荒状态,仍然会将古史追溯到最初的起点,而这个历史的开端便是“文明”。

胡宏在其著作中,称道盘古、伏羲、神农、黄帝。他不仅认可邵雍“皇—帝—王—霸”的史观,而且还记述了“女娲补天”(解释为女主治事),甚至以五声、五行比附仁义礼智信五常(题为“宫声玄妙”)。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文字并非儒家子学著作,而确实是宋人的历史著述。

我国古史中早有关于伏羲、神农的记载,如《尚书大传》卷三《略说》说:

“遂人为遂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盖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天地人之道备,而三五之运兴矣。”(《风俗通·皇霸》第一引,又《太平御览》七十七皇王部二、七十八皇王部三、火部一,《初学记》九,《事类赋》注,《艺文类聚》卷十一帝王,《路史·因提纪》,均有节引。)

又说:

“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罗壁《识遗》卷二引)

司马迁《史记》不取“三皇”,断自“五帝”,至唐代司马贞补作《三皇本纪》,20 世纪 50 年代顾颉刚领衔标点《史记》又予删除。

相较之下,以五声、五行、五常记述古史,比追记伏羲、神农之遥似乎更加极端,所以现代以来,顾颉刚反复批评刘歆《世经》伪造历史,称其“五德更始”之说不可信。但是实际上,现代生活中以“三五”等数字形式“整理故事”的事例,更不胜数。所以早先冯友兰先生便辩驳道:

“五德之转移,及三统之循环,皆有一定的次序。火德之后,一定是水德。白统之后,一定是赤统。这一个朝代若是火德,他一定要行一种什么制度。若是水德,一定要换一种别样的制度,白统赤统亦复如是。这都是一定的公式,不论人愿意不愿意,历史是要这样走的。这一点意思,我们现在还用得着。所谓唯物史观就是有这个意思。依照唯物史观的说法,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要一有变化,其它方面制度,也一定跟着要变。……没有永久不变的社会制度……每一套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也各有其历史的使命,例如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使命,是把一切事业集中,社会化,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预备。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完全成功的时候,也就是他应该,而且必须让位的时候。”^[3]

胡宏的历史观可谓儒家义理之学在历史著述中的延伸。清初学术以朴学考据为盛,但是学者对于胡宏这样一种历史态度,仍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这是

非常难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

“胡宏，字仁仲，号五峰，崇安人，安国之季子也。以荫补承务郎。绍兴中尝上书忤秦桧，久不调。桧死，始召用，辞疾不赴。事迹附载《宋史·儒林传·胡安国传》中。是书成于绍兴辛酉，绍定间尝宣取入秘阁。所述上起盘古，下迄周末。前二卷皆粗存名号事迹。帝尧以后，始用《皇极经世》编年，博采经传，而附以论断。陈振孙《书录解题》尝讥其误取《庄子》寓言，及叙邃古之初，无征不信。然古帝王名号可考，统系斯存，典籍相传，岂得遽为删削？至其采摭浩繁，虽不免小有出入，较之罗泌《路史》，则切实多矣，未可以一眚掩也。”

（三）太极与太一——罗泌的历史观

罗泌著《路史》四十七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道：

“罗泌，字长源，庐陵人。是书成于乾道庚寅。凡《前纪》九卷，述初三皇至阴康、无怀之事；《后纪》十四卷，述太昊至夏履癸之事；《国名纪》八卷，述上古至三代诸国姓氏地理，下逮两汉之末；《发挥》六卷、《余论》十卷，皆辨难考证之文。”“《自序》谓皇甫谧之《世纪》、樵周之《史考》、张悌之《系谱》、马总之《通历》、诸葛耽之《帝录》、姚恭年之《历帝纪》、小司马之《补史》、刘恕之《通鉴外纪》，其学浅狭，不足取信。苏辙《古史》第发明索隐之旧，未为全书。因著是编。”“《尔雅》训‘路’为‘大’，所谓《路史》，盖曰‘大史’也。”

《路史》的《后纪》始于太昊、炎帝，而《前纪》所记始于“初天皇、初地皇、初人皇”，中间史皇氏、栢皇氏、中皇氏、大庭氏、栗陆氏、昆连氏、轩辕氏、赫苏氏、葛天氏、尊卢氏、祝诵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无怀氏，乃与《庄子·胠篋》所记古十二君“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最为接近，又在管仲所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之数。而由于此书包括《前纪》、《后纪》及史论、考辨，征引浩博，体系周密，学者多称引之。

清代官学的评价，批评者少，肯定者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

“皇古之事，本为茫昧。泌多采纬书，已不足据。至于《太平经》、《洞神经》、《丹壶记》之类，皆道家依托之言，乃一一据为典要，殊不免庞杂之讥。《发挥》、《余论》皆深斥佛教。而说《易》数篇，乃又取道家。其‘青阳遗珠’一条，论大惑有九，以贪仙为材者之惑、谀物为不材之惑，尤为偏驳。然引据浩博，文采瑰丽。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曰：‘羲农

轩皐之源，山渎鍾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词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词人，采摭英华。’泌之是书，殆于此类。至其《国名纪》、《发挥》、《余论》，考证辨难，语多精核，亦颇有祛惑持正之论，固未可尽以好异斥矣。”

这篇提要，批评其不可信由乎文献，肯定其可信亦由乎文献，而其肯定乃援引《文心雕龙》之语，颇出人意外。实际上《路史》还有一极为惊人之处，就是以《易经》、“太极”入史。对此充满理学意味的做法，《四库提要》没有加以批评，似乎也有默认。

《发挥》卷首有《论太极》、《明易象象》、《易之名》三篇，今人骤然见此，很容易误认为哲学著作。《易经·系辞上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句话现代学者只当作哲学思想加以讨论，罗泌则完全用以描述历史的流变，如说：“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前纪一》）

《老子·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句话现代学者只当作道家哲学来讨论，罗泌则用以解释“太极”，如说：“太极者，即太一也。有物之先，本已混成。”

这个混成的整体，尚有一定的物质性，即“有物”的“形下”的方面。但罗泌又说：“事有不可尽究，物有不可臆言。”（《前纪一》）“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夷；性不可以辨，辨之益晦惑。”（《论太极》）这就将古史进一步上推到“无言”、“无辨”、“无名”的境地，亦即上推到抽象绝对之“无”，而与现代哲学概念的讨论完全同步了。

罗泌引《列子·天瑞》说：“有形者生于无形。”又说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这段话出自《前纪一》，实际上可视为《路史》全书的序言，而由现代眼光看来，极似一篇哲学导论。

然而，罗泌的确是在讨论史学问题。他说：“易无形埒……一者，形变之始也。”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认为万物均始于一，历史也不例外，亦始于一，并且归于一。这确是他的历史观，而不是哲学观。

（四）延伸编年史——刘恕与金履祥的历史观

刘恕著《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虽然刘恕是亲身参与《资治通鉴》编纂的史官，但仍留下了《通鉴外纪》这部独著的史书，将《资治通鉴》所记述的起自战国的古史向上延伸到了伏羲时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

“刘恕,字道原,其先世京兆万年人。祖受为临川令,葬于高安,因家焉。《宋史》本传称其举进士入高等,不著何年。考司马光作此书《序》,称恕卒于元丰元年九月,年四十七,则当生于明道元年。又称其登第时年十八,则皇祐元年进士也。初授钜鹿主簿,寻迁知和州、翁源二县。会司马光受诏修《资治通鉴》,奏以恕同司编纂,转著作郎。熙宁四年以忤王安石乞终养,改秘书丞,仍令就家续成前书,遂终于家。此书乃其临没所成也。盖修《资治通鉴》时,恕欲与司马光采宋一祖四宗实录国史为《后纪》,而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前纪》。会遭忧遘疾,右肢痹废,知远方不可得国书,《后纪》必不能就,乃口授其子义仲以成此书,改名曰《外纪》。凡《包羲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又《目录》五卷。年经事纬,上列朔闰天象,下列《外纪》之卷数,悉与司马光《通鉴目录》例相同。”

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十八卷、《举要》二卷。虽然此书专为补《资治通鉴》而作,但其实难以确定上古年代。即便如此,金履祥还是将《资治通鉴》所记述的古史向上延伸到虞舜时代,使之与《尚书·二典》相齐。其论次目录如卷一《陶唐氏帝尧》有“甲辰元载乃命羲和”、“二载定闰法”、“六十有一载洪水咨四岳”、“七十载举舜登庸”等,多据《尚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

“金履祥,字吉父,号仁山,兰溪人。从学于王柏。德祐初,以史馆编修召,不赴。入元,隐居教授以终。事迹具《元史·儒学传》。”

又引柳贯《履祥行状》说:

“司马文正作《资治通鉴》,系年著代。秘书丞刘恕作《外纪》,以记前事。顾其志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不足传信。乃用邵氏《皇极经世书》、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复加训释。断自唐尧,以下接于《资治通鉴》,勒为一书。既成,以授门人许谦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嚆言懿行,后王所当法。战国申、韩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后,司马公既已论次。而春秋以前无编年之书,是编固不可少之著也。”

由此可知,两宋不仅出现了以“义理”乃至“象数”入史学的现象,同时也存在着撰写编年史和延伸编年史的现象。实际上,就连司马光自己也单独撰写了《稽古录》二十卷,“上溯伏羲,下迄英宗治平

之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两宋以后,延伸编年史的做法仍在继续,譬如:明陈士元撰《荒史》六卷,述洪荒开辟之事,“《九头》等十纪之前,增以《元始本纪》,言盘古;《二灵本纪》,言天皇、地皇,共为十二纪。《疏仡纪》则至帝摯止焉,共为三卷”。明朱谋玮撰《邃古记》八卷,“所记始于盘古,迄于有虞。提纲纪事,而杂引诸书以为目”明郭之奇撰《稽古编》五十五卷,“所载自上古至秦而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降及清代,马骥撰《绎史》一百六十卷,包括《太古》十卷、《三代》二十卷、《春秋》七十卷、《战国》五十卷等。李学孔撰《皇王史订》四卷,“上自盘古氏,下迄周幽王。东迁而后,《春秋》既作,则不复录焉”。王万澍撰《衡湘稽古》五卷,“以衡湘为古帝王巡狩都会之区,春秋时芊楚兼并,圣人屏之,后人遂忘其先之盛。于是历述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夏、商二代以迄周昭,撰为此录。每事标举其纲,而杂引群书为目。多摭自《路史》诸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这些史著,大多受到了清代官学的批评。如批评陈士元“大抵以罗泌《路史》为蓝本,而稍附益之,皆恍惚无稽之说。胡宏《皇王大纪》未至侈谈神异,陈振孙《书录解题》已有无征不信之疑,况动引《道藏》以为史乎?”批评朱谋玮“大抵出入于刘恕《外纪》、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前纪》、金履祥《通鉴前编》之间。所引多纬书荒诞之说,既非信史,又鲜异闻。谋玮号为博洽,平生著述一百余种,今不尽传。其传者,此为最劣矣”。批评郭之奇“以各代君臣分为表、传。夏以前则全抄《路史》禅通诸纪”。批评马骥“其疏漏抵牾,间亦不免”。批评李学孔“大抵摭拾罗泌《路史》之说,加以臆断耳”。批评王万澍“亦好僻之士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但无论如何,自宋代以后,史著层出不穷,务求追溯上古,表现出共同的趋向,确是事实。

三 结语

通过对邵雍、胡宏、罗泌、刘恕与金履祥五家史著四种倾向的分析,一方面可知宋代学者的历史哲学与先秦时期的几种历史观念构成前后对应,另一方面可知其史官使命仍然延续了《春秋》以来的史学传统,特别是与“求实”平行的“大义”传统。这一状况首先可以启发人们重新认识现代史学的责任所在,甚至重新认识史学、哲学与政治学的学科划分,从方法到宗旨都给予现代学术以必要的启迪。

(一)在现代学科背景下,学者可以在“哲学”范围内研究《易经》、《老子》,讨论“太极”与“无”、“无名”诸问题;可以在“政治史”范围内研究“国家”与“政权”,并且普遍认同以版图完整与国家民族统一为进步标志。但是在上古史、文明起源领域内,学者往往持保守态度,大多持多元而含糊的观点,很少有人可以将文明起源与哲学之“无”、政治之“一统”会通起来。

(二)在现代史学学科背景下的上古史研究,即使借助考古学的科技手段,实际上仍难以复原系统的古史原貌,其不得已的存疑待考态度,明显限制着中古、近古历史观的构建,限制着现代社会对于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初始形态的认识。

(三)宋代学者的历史观,以整齐、归一、文明、退化几个主要特征,其去古愈远,理学气质愈加明显,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学者理想中的文明模式,体现着古人一贯的“移易风俗”的高雅化取径。自《春秋》以来,我国古代史学一方面以“良史”、“实录”为传统,一方面以“褒贬”、“讥讽”为传统^[4]。宋人历史观的理学化、理想化,应当视为中古史学精神的一种独特形态。

(四)我国古代史官之学,在历史叙述上表现为“退化”,在理想依托上表现为一种极久远、极高明

的追求,并且在当世政治现实中对当权者发挥显著的约束和钳制作用,实际上体现为一种人文主义的积极主动,或说一种人文精神的长足“进化”。盖厚古必薄今,薄今则可以谨慎戒备;薄古必厚今,厚今必导致胆大妄为。其祸福倚伏有如此者。现代史学在叙述上表现为一种无始无终的直线进化,其理想蓝图既不肯寄托于古代,又无法寄托于将来,实际上流于缥缈虚无,而对于当世政治权力的约束与钳制已被完全消解,故而所谓“精神”、“文明”也难以舒展。古代社会可以物质不充分,但却无妨成就经学—史官学、诸子学—哲学、诗赋—文学的时代,总之成就人文与文明的时代,而现代社会只是物质时代、商品时代、利欲时代。

[参考文献]

[1] 顾颉刚. 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M] // 顾颉刚读书笔记:第4卷.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2340-2341.

[2] 李学勤.《尧典》与甲骨卜辞的叹词“俞”[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5-7.

[3] 冯友兰. 新三统五德论[N]. 北平晨报,1934-11-26.

[4] 张京华.《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J]. 殷都学刊,2001(4):38-41.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Song dynasty schola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ZHANG Jing-hua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Yongzhou Hunan 425199,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oughly combed four tendencies in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by citing Shao Yong’s Huang Ji Jing Shi, Hu Hong’s Huang Wang Da Ji, Luo Mi’s Lu Shi, Liu Shu’s Tong Jian Wai Ji and Jin Lvxiang’s Zi Zhi Tong Jian Qian Bian as examples. The history books with philosophical meaning of Song Dynasty scholar are similar to the modern academic’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lthough different from the empirical method, it still has a long academic tradition and positive academic influence. Particularly,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t Song Dynasty scholar put the elegant civilization as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when they trace the ancient times - which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history.

Key words: the beginning of ancient history;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